

# 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 对成都的三重地理想象

杨 挺

(成都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成都 610106)

**摘要:**安史之乱起,唐玄宗被迫幸蜀。一年后,玄宗离蜀返京。肃宗为尊崇其巡幸之所,将蜀郡升为南京。这一事件在李白的心中激起万千感触,为此他写作了组诗《上皇西巡南京歌》,其中使用了三种不同的视角来构想成都:帝都眼光的审视、古蜀神话的附丽、自我易位的想象。

**关键词:**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成都;地理;想象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4)02-0143-07

唐肃宗至德二年(757)下制,改蜀郡为南京<sup>①</sup>。此后,李白写下《上皇西巡南京歌》组诗(以下简称《南京歌》)<sup>[1]卷八,434-441</sup>,纪赞其事。写作此诗时,李白既不在长安,也不在成都,却密切地关注着玄宗西巡与成都升京等事态的发展<sup>②</sup>。这种身体缺席与心灵在场的特殊视角使他对成都的书写,表现出奇特的地理想象,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 一 蜀地经验与长安记忆:京都眼光审视下的成都

李白生长于蜀地,出川前多次出游成都,对其间风物颇为熟悉。出川后,李白曾经两至长安<sup>[2]30</sup>。尤其是第二次入京,受到玄宗召见,出入长安最为显贵的地方。“每一个人都会与自己生活的城市的某一部分联系密切,对城市的印象必然沉浸在记忆中,意味深长”<sup>[3]1</sup>。玄宗幸蜀、成都升京这一系列的历史机缘,触发了正逃亡越中的诗人对故乡成都的怀想。在这样的怀想中,他每每用长安的城市要素来检查成都的城市特征,从而流露出他的“京都眼

光”。

(一)万户千门:建章宫(大明宫)与成都

《南京歌》其一末句有“石为楼阁九天开”,其二首句有“九天开出一成都”,以蝉联手法道出:成都形胜,实乃天造地设。其二续有“万户千门入画图”一句,注家往往不加留意。如果我们联系其一“胡尘轻拂建章台,圣主西巡蜀道来”一联,即会发现,这里的“万户千门”其实来自对建章宫的历史想象。据司马迁《史记·孝武本纪》所载,“(武帝)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sup>[4]卷十二,482</sup>。显然,李白的“万户千门”暗承建章宫“千门万户”而来。我们知道,从卢照邻《长安古意》中的“啼花戏蝶千门侧,碧树银台万种色”<sup>[5]78</sup>,到骆宾王《帝京篇》中的“三条九陌丽城隈,万户千门平旦开”<sup>[6]卷一,7-8</sup>,初唐已经存在一个京都书写的传统,而李白的成都描摹似乎沿袭了这一传统。

令人疑惑的是,成都根本没有一座宫殿堪与建章宫相比,李白怎么可能把建章宫的规制移评于成

收稿日期:2013-07-20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李白文化研究中心”项目“李白的城市经验与文学反应”(编号:LB10-15)的阶段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杨挺(1974—),男,土家族,贵州铜仁人,文学博士,成都学院(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都呢?我们知道,李白在天宝元年(742)受诏入京<sup>[2]55</sup>,玄宗曾经于大明宫中的金銮殿召见他,遂命待诏翰林,而翰林院即置于大明宫之内<sup>[7]卷四,《东内西内学士及翰林院图》</sup>,李白对大明宫的格局应至为熟悉。那么,这里的建章宫应该可以代指唐代的大明宫。因此,成都的“万户千门”根本就是他的“梦回长安”。李白在此用建章宫(大明宫)“万户千门”比附成都,将对建章宫的想象与大明宫的观感,移视蜀郡成都,赋予成都以帝都气象,以与升制南京之盛事相应。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李白对成都市景的描写中混合着对长安皇官书写传统的挪用,其间可能还潜藏着“尊王”的努力,这在安史之乱的政治背景下尤显意味深长。

## (二)温泉侍君:旧宫(新丰)与新都(华阳)

《南京歌》其三有“华阳春树似新丰,行入新都若旧宫”一联<sup>③</sup>。新丰原得名于汉高祖的孝举<sup>④</sup>。萧士赟提出:“肃宗即位于灵武,尊明皇为太上皇,故用此事也。”<sup>[8]1183</sup>唐汝询《唐诗解》、吴昌祺《删定唐诗解》不同意萧说,都指出其“如旧之意”,惜乎所言不明。那么李白在这里为什么要提到新丰这个地方呢?

我们只要考察一下新丰会给李白留下什么印象,就会明白诗人此处的用心。从先天二年(713)一直到安史之乱发生时的天宝十四年(755),玄宗基本上每年都要一次甚至多次去新丰<sup>⑤</sup>,因为新丰有玄宗喜爱的温泉。而对于李白来说,两年翰林院随侍生活,伴驾新丰温泉宫可谓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阶段。据其《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云“幸陪鸾辇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驹”<sup>[1]卷九,485</sup>,得意之情,颇溢于言表。后又有《温泉侍从归逢故人》云:“激赏摇天笔,承恩赐御衣”<sup>[1]卷九,486</sup>,夸耀之欲,亦按捺不住。

值得提醒的是,新丰温泉宫在天宝六年(747)被改名为华清宫<sup>⑥</sup>。李白在诗中只提新丰,而不提“华清”,固然与新丰温泉宫改名时,他已经离开长安有关。再者,也许“华清”太容易触发玄宗的隐痛和世人的误解。所以,“新丰”这个名称,既有对那一段君臣相得岁月的怀念,也有对李、杨“华清宫时代”的回避,这都关系到玄宗政治形象的维护。

## (三)游乐之风:渭水(曲江池)与锦江(七星桥)

《南京歌》其五有云“万国同风共一时,锦江何

谢曲江池”,以成都锦江比对长安的曲江池。据唐代康骈《剧谈录》所载可知,曲江池本为长安的游乐之所<sup>[9]卷下,1495</sup>。因中和、上巳之时,玄宗常于此池,“赐宴臣僚”,上行而下效,遂演为京都风气。可以说,曲江池是君臣同乐、共享太平的空间象征。

而锦江之于成都,有如渭水之于长安。“锦水东流绕锦城”,它不仅滋养着这个城市,也赋予成都以逸游的文化性格。杜氏《壶中赘录》载:“蜀中风俗,旧以二月二日为踏青节。都人士女,络绎游赏,缇幕歌酒,散在四郊。”<sup>[10]卷一,11</sup>唐五代时百花潭至万里桥一线,已是市民游乐的集中场所<sup>[11]卷三十七,538</sup>。联系李白《宫中行乐词》其三“君王多乐事,还与万方同”<sup>[1]卷五,298</sup>一句,足见《南京歌》其五“万国同风共一时”并非泛言,而实指游乐之风。或许诗人将成都游乐视为京都游乐的延伸,用锦江与曲江池的拼接,借以减轻玄宗对成都的陌生感。

## (四)林苑楼池:上林苑与摩河池(散花楼)

《南京歌》其六有“北地虽夸上林苑,南京还有散花楼”一句。我们知道,汉代园林,以上林苑最为繁盛<sup>[12]卷四,230</sup>。其中离宫别馆、奇树异草、珍禽百兽,不可胜数。而所谓“北地虽夸上林苑”更是事出有因,即司马相如所奏《上林赋》<sup>[13]卷第十九,449</sup>。在司马相如的笔下,“终始霸产,出入泾渭,酆镐潦滂,纡徐委蛇,经营其内。荡荡兮八川分流,相背异态”<sup>[14]卷五十七上,2547—2548</sup>,规模浩大,罕有其匹。虽王莽修九庙,将其中宫观大量拆毁<sup>⑦</sup>,但至唐时,其规模仍然可观<sup>⑧</sup>。

以上林苑之眼光审视成都,实无禁苑可以当之。但李白独举散花楼比之,其间用意,耐人寻味。此楼原得名于天女散花的传说<sup>[15]卷二引《舆地纪胜》,24</sup>,由隋朝蜀王杨秀所建<sup>[16]卷一百七十一,451</sup>。李白此处所举散花楼实可兼言摩河池。曾有胡僧谓之“摩河池宫毘罗”,意为“广大有龙”,因名“摩河池”<sup>⑨</sup>。对于唐代摩河池的情况,杜甫《晚秋陪严郑公摩河池泛舟得溪字》云“坐触鸳鸯起,巢倾翡翠低。莫须惊白鹭,为伴宿青溪”<sup>[17]卷十四,1185</sup>,可见其珍禽丛出。又畅当《偶宴西蜀摩河池》诗云:“珍木郁清池,风荷左右披。”<sup>[18]第五函第四册,730</sup>显其林木茂盛。此池经前蜀王衍扩治,方才延袤至十里<sup>[19]卷上,9</sup>,与“上林苑方三百里”,仍差之甚远。那么李白何以独举散花楼,以与上林苑相匹呢?

“对环境的清晰意象是个体成长的一个必要基

础。”<sup>[3]3</sup>开元八年(720)春,青年李白游成都,作《登锦城散花楼》诗<sup>⑩</sup>。诗中有云:“金窗夹绣户,珠箔悬琼钩。飞梯绿云中,极目散我忧。”可见成都的优美风景,让这个年方二十的青年为之着迷。当时的他对未来充满着希望,“暮雨向三峡,春江绕双流。今来一登望,如上九天游”,散花楼的明丽风景伴随着青年李白春天般的梦想。“(环境意象)是个体头脑对外部环境归纳出的图像,是直接感觉与过去经验记忆的共产物,可以用来掌握信息进而指导行为”<sup>[3]3</sup>。至德二年(757),已经身陷囹圄的李白,散花楼一定在他心目中保留着美好的印象,以致在《南京歌》中孤楼迥出,可以独当上林。

## 二 不灭的古蜀国:神话与传说附丽的成都

人文地理学家普林斯(H.C.Prince)说:“在弄懂景观之前,我们必须理解人和他的文化。”<sup>⑪</sup>蜀地文化异于中原,传说丰富,至其山麓关隘、河流古道、土台城池,多有历史、神话附焉。成都,作为古蜀国的都城<sup>⑫</sup>,在李白的眼中,它处处附着了神话的奇谲和传说的瑰丽。

### (一)剑阁峨嵋:古蜀国的四域边界

蜀地生民,其始悠远<sup>[20]卷七十二,1457-1458</sup>。到战国时期,蜀地产生了一个强大的王国。这个王国北至汉中,南至峨眉,西至玉垒,一度称霸西南<sup>[21]卷三,118</sup>。虽然这个古蜀国在秦惠王时为秦所亡,引人慨叹,但强大的王国始终活在蜀人的心中。

在李白《南京歌》中,剑阁是蜀都的北门。其一有“剑壁门高五千尺,石为楼阁九天开”,其十又有“剑阁重关蜀北门,上皇归马若云屯”。显然,剑阁在李白心中就是蜀国的北大门。从城市地理学的角度来看,剑阁可谓入蜀的一个“节点”。凯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中指出:

节点是观察者可以进入的战略性焦点,典型的如道路连接点或某些特征的集中点。……连接点或是交通线的中断处,不容置疑地对城市的观察者有一定的重要性,因为人们必须在此作出抉择。他们在此会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对连接点附近的元素了解得更加清楚。……位于连接点的元素由于其位置的特殊性,自然而然地被假设具有了特别的重要性。<sup>[3]55</sup>

作为“节点”的剑阁,对于诗人的观察亦极为重要<sup>⑬</sup>。诗人曾在《蜀道难》中进行过描摹:“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sup>[1]卷三,165</sup>夸饰其狰狞险恶。

而这里“剑壁门高五千尺,石为楼阁九天开”,更多展现其巍峨奇峻,从而突显其作为蜀都北部门户的重要位置。

蜀都向西,则为玉垒。《南京歌》其四有“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长安”。李白在这里进行了地理拼接与空间转换:似乎随着车驾的西巡,脚下的渭水变成锦江;天空旋转,长安变成了玉垒。这里玉垒自然可以代指成都,但玉垒又绝非仅作为成都的代称。它更多时候是作为蜀国的西界而存在的。左思《蜀都赋》说“包玉垒而为宇”<sup>[22]卷四,75</sup>,《华阳国志》云“玉垒、峨眉为城郭”<sup>[21]卷三,118</sup>,李白心中的蜀都显然继承了这一边界。据《方輿胜览》卷五十五《茂州·山川》载:“玉垒山,在汶川县东四里。出璧玉。”<sup>⑭[23]卷五十五,982</sup>同卷《永康军·山川》(治灌口镇)更有玉垒山,“在导江县西北二十九里,《汉地理志》云‘湔水所出’”<sup>[23]985</sup>。此可见蜀有玉垒山多处,甚至同时存在。或许蜀人原居汶川玉垒,后沿岷江而到导江县定居时,他们又面当大山,仍以原居山名命之。如此假设成立,则诸处玉垒正好反映蜀人开发踪迹的渐次延伸<sup>⑮</sup>。因此,在李白心中,玉垒或许还象征着古蜀文化的地理渊源。

至于峨眉,可谓是蜀都的南大门。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自言“近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来”<sup>[1]卷第二十六,1225</sup>,又《江西送友人之罗浮》中“尔去之罗浮,我还憩峨眉”<sup>[1]卷第十八,859</sup>,可见峨眉已然成为李白故乡的代称。而《南京歌》其七有:“四海此中朝圣主,峨眉山上列仙庭。”想象玄宗于峨眉山上开列仙庭,接受朝拜。峨眉山是道教的第七洞天<sup>⑯</sup>,李白信奉道教,有所尊崇,亦属自然。但我们还注意到《华阳国志》所说“玉垒、峨眉为城郭”。成都既为南京,则峨眉当为南郭,古蜀历史与神话仍然是李白地理想象的重要资源。

### (二)金牛汉水:古蜀国的对外联系

《南京歌》其八有“秦开蜀道置金牛”,展示了古蜀国陆路向北的对外联系。于来敏《本蜀论》谓秦“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屎金”,于是蜀王开道迎之,秦军顺道而灭蜀<sup>[13]卷二十七引</sup>。秦灭蜀的历史真相,我们已经无法得知,我们仍能从这个对于蜀国充满嘲弄的记载中大体探知古蜀国为对外交通所作的努力。在李白的诗中,金牛大道后来也成为玄宗巡蜀的通道。“人们正是在道路上移动的同时观察着城市,其它的环境元素也是沿着道路展开布局,因此

与之密切相关的”<sup>[3]35</sup>。显然,蜀道正是“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长安”中布局展开和视点移易的交通基础。

《南京歌》其八说“汉水元通星汉流”,对于此句,一般注家以“黄河之水天上来”解之,民间传说也存在着汉水遥通天汉的传说<sup>⑩</sup>。不过,酈道元《水经注》对汉水有一段评述,或可使我们的思路更为开阔:

川流隐伏,卒难详照,地理潜闭,变通无方。……虽津流派别,枝渠势悬,原始要终,潜流或一,故俱受汉、漾之名,纳方土之称,是其有汉川、汉阳、广汉、汉寿之号,或因其始,或据其终,纵异名互见,犹为汉、漾矣。川共目殊,或亦在斯。<sup>[13]卷二十,478</sup>

由此看来,汉水既是川陕文化血脉相联的一条纽带,也是玄宗西巡成都之行踪的地理见证。

### (三)石镜娥眉:古蜀国的标志文物

据《华阳国志》载,蜀王“为妃作冢”,“上有石镜”<sup>[21]卷三,123</sup>。由此,此石镜成为古蜀国的标志性文物。“一旦某个物体拥有了一段历史、一个符号或某种意蕴,那它作为标志物的地位也将得到提升”<sup>[3]62</sup>。李白多次将此传说之中的石镜,作为蜀都怀想的标志<sup>⑪</sup>。如李白居长安时,其所作诗《金门答苏秀才》中就有“月出石镜间,松鸣风琴里”<sup>[1]卷十九,883</sup>,石镜与明月交相辉映。而《南京歌》其五的“石镜更明天上月,后宫亲得照娥眉”,石镜之明,超过明月,诗人意欲突显石镜的地位。

《太平寰宇记》谓石镜“厚五寸,径五尺,莹彻,号曰石镜”<sup>[20]卷七十二,1464</sup>,或许石镜确实光可照人。但“后宫亲得照娥眉”,另有渊源。据《天宝逸事》载:“明皇幸南京,多以宫人自随,乃令成都画手,画为十眉以赐之。”<sup>[15]卷四</sup>玄宗幸蜀时之随驾宫人,其梳妆应作京都式样。成都画手又画得诸般眉目,玄宗可以赠之宫人。石镜之明亮,可照玄宗后宫之娥眉。可见,蜀地风物可为玄宗西巡抚慰压惊,更为玄宗驻蹕增辉添彩。

### 三 “想象的自我易位”:玄宗幸蜀时眼中的成都

我们前面提到,玄宗幸蜀,李白当时在越中,并未随驾。但《南京歌》中,我们却能感觉到,他随驾玄宗、西巡成都,“设身处地”地讲述着途经见闻和感受。其实,这正是一种“想象的自我易位”(imagi-

native self-transposal)的视角<sup>⑫</sup>。

#### (一)巡蜀行踪与蜀都地位

据《旧唐书·玄宗本纪》载,玄宗仓皇奔蜀,慌不择路,甚至食物都不能为继。“丙申(14日),次马嵬驿”<sup>⑬</sup>,在此又发生了令玄宗为之心恻的兵变<sup>[24]卷十,232-234</sup>。显然,这是一次颇为狼狈而沉痛的奔蜀。或许李白当时并未随驾,不能亲历,想象不到实际情况的惨淡。《南京歌》其四有云:“谁道君王行路难,六龙西幸万人欢”,这里是李白想象的玄宗入蜀,字里行间充满着荣幸感。据《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四》载,当玄宗一行至河池郡时,“崔圆奉表迎车驾”,“上大悦”<sup>[25]卷二百一十八,6978</sup>。可以想见“蜀土丰稔,甲兵全盛”给惊恐未定的玄宗以多么强烈的安全感。

组诗其四“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长安”,入蜀即得到压惊与安抚,李白似乎急切地想将一种安全感传达给玄宗。组诗其八的“天子一行遗圣迹,锦城长作帝王州”,则概括出蜀人对玄宗巡蜀、成都升京的荣幸感<sup>⑭</sup>。如果说在诗人对故乡的自矜中,安全感油然而生,那么,在玄宗巡幸的想象性在场中,荣幸感则相伴始终。

#### (二)驻蹕成都与蜀地风物

从至德元年(756)七月“庚辰(二十八日)车驾至蜀郡”<sup>[24]卷九,234</sup>,到至德二年(757)九月丁卯(二十三日)“上皇发蜀郡”,玄宗驻蹕成都,在此总共度过一年近两个月的时间。

李白多夸蜀地风物佳盛,《南京歌》其三有谓:“柳色未饶秦地绿,花光不减上林红。”我们知道,由于成都气候温润,草木之荣盛于三秦,自然“水绿天青,风光和暖”。其下又说“万国烟花随玉辇,西来添作锦江春”,意思是成都作为南京之后,其他地方春色亦将随帝而来,锦上添花。看来,玄宗驻蜀,万国烟花亦齐聚此都,锦城为之蓬荜生辉,诗人李白是发自内心的荣幸。

其七有“锦水东流绕锦城,星桥北挂象天星”,其间“星桥北挂象天星”,源于李冰治蜀时,造七桥以应七星的传说<sup>[21]152</sup>。诗人列此,当然是意寓成都上与天应,作为帝都,当之无愧。不过,关于玄宗幸蜀,另有一段传说,与此相关。据唐代李肇《唐国史补》云:“蜀郡有万里桥,玄宗至而喜曰:‘吾常自知,行地万里则归。’”<sup>⑮[26]卷上,165</sup>。雷弗尔(Relph)说,“对个人和对人的群体来说,地方都是安全感和身

份认同的源泉”<sup>[27]6</sup>。蜀地对于李白具有地方感,地方感自然会产生安全感。凯文·林奇进一步指出:

一处好的环境意象能够使拥有者在感情上产生十分重要的安全感,能由此在自己与外部世界之间建立协调的关系,它是一种与迷失方向之后的恐惧相反的感觉。这意味着,最甜美的感觉是家,不仅熟悉,而且与众不同。<sup>[3]3</sup>

诗人家乡的风物,为欢迎玄宗的到来而分外明媚。因此,《南京歌》其实也可看成是李白笔下城、春、水、桥相得益彰的锦城春色图。在李白的诗中,他们替代着诗人,达成与玄宗的交流,从而让玄宗在蜀地重新获得安全感。

### (三)水路形胜与蜀吴关联

《南京歌》其六有:“濯锦清江万里流,云帆龙舸下扬州。”唐宋时期,蜀中的重要对外联系还有水路,即顺江而下,历眉州、嘉州、叙州、泸州而出川,更可东至吴越<sup>[28]卷上,187</sup>。

我们不能确定,此处“濯锦清江万里流,云帆龙舸下扬州”所隐含的方向指示是否与永王事件有关。但可以肯定的是,唐时已有“扬一益二”之说,蜀中虽与东吴有数千里之遥,但却通过江水航运,血脉相连。杜甫《严公厅宴同咏蜀道画图》即有“华夷山不断,吴蜀水相通”<sup>[17]卷十一,905</sup>之句,可见蜀地居长江水路形胜之势已为当时共识。此时,我们若多从诗人自身的经历切入,或可顿悟:这一条水路恰好是

青年李白出川的行迹。人文地理学家斯皮格尔伯格指出:

……研究者想象自己占据着别人的真实位置,并在那里观察世界,就像从这个新的观察角度看,世界本身会表现出的那个样子。……[研究者]尽其所能地在想象上适应别人头脑的框架。这种立场的思路要从别人的第一手感知中,和从可得到的他的传记的事实中导出。<sup>②</sup>

这正是李白对玄宗巡蜀的“想象的自我易位”,他当然会将自身经历与见闻渗入诗中。他想象自己占据着玄宗的位置,通过玄宗的眼睛来观察成都,假想玄宗巡幸成都时的见闻与感受,虽然实际上展现的仍然是李白自己的蜀地经验与蜀都印象。

### 四 总结性评价:地理想象与文学重构

我们经过分析,可以发现,在《上皇西巡南京歌》中,李白利用了三重想象来建构成都的地理意象:一是帝都眼光的审视;二是古蜀神话的附丽;三是自我易位的玄宗观感。人文地理学家迈尼希(Meinig)指出:“作家们不仅描述这个世界,他们还帮助它的形成。他们非常形象的制造出一些强烈印象,影响着公众对我们景观和区域的态度。”<sup>③</sup>李白正是如此,他通过三重地理构想,将与长安相比照的成都、神话想象之下的成都、玄宗眼中的成都加以融汇,集中地表现了成都乃至四川丰富而多面的城市形象与地域印象。

### 注释:

- ①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十二月戊午朔,肃宗“改蜀郡为南京,凤翔府为西京,西京改为中京,蜀郡改为成都府。凤翔府官寮,并同三京名号”(刘昫等《旧唐书》卷十《肃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50页)。乾元三年(760)九月甲午(七日)“以荆州为南都,州曰江陵府,官吏制置同京兆。其蜀郡先为南京,宜复为蜀郡”(同上,第259页)。成都作为南京,共有两年零九个月的时间。
- ②天宝三年(744)三月,李白因“非廊庙器”,已被赐金放还(见:安旗、薛天纬《李白年谱》,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59页)。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丙寅(十一日)安史之乱起时,李白已经在南方。次年秋,闻贼破潼关,玄宗奔蜀,遂沿江而西,入庐山,隐于屏风叠。可知玄宗巡蜀,李白并未随驾(同上,第94-95页)。
- ③王琦注云:“《华阳国志·蜀志》云:地称天府,原曰华阳。是称蜀地为华阳,其来旧矣。”今从王说。见:李白撰、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八,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36页。
- ④王琦注引《西京杂记》卷三:“太上皇徙长安,居深宫,凄怆不乐。高祖因左右问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酷酒、卖饼、斗鸡、蹴鞠,以此为欢,今皆无此,故以不乐。高祖乃作新丰,移诸故人实之,太上皇乃悦。”参见:李白撰、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八,第436页。
- ⑤玄宗除了开元十二年到十四年间因幸东都,而没去新丰温泉宫之外,其他每年都要去,短则十天,长则一月。《旧唐书·玄宗本纪》载之甚详。
- ⑥“华清宫者,本太宗温泉宫也,天宝六载,始名华清。”(程大昌撰、黄永年点校《雍录》卷四,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84页)玄宗将新丰温泉宫改为华清宫,时间上恰好与玄宗与贵妃之间感情升温相应(参见:《旧唐书》卷五十一《列传第一·后妃上》,

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2178-2179 页)。

- ⑦“(王莽)坏彻城西苑中建章、承光、包阳、大台、储元宫及平乐、当路、阳禄馆,凡十余所。取其材瓦,以起九庙。”参见: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中华书局 1964 年版,第 4162 页。
- ⑧唐时上林署,属司农寺金属工部,“令掌苑囿园池之事”,可知唐时上林苑仍有专门管理(刘昫《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志》,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1886 页)。
- ⑨司马光编纂、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二引《成都记》(中华书局 1956 年版,第 8153 页)。又据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四:“《蜀棹机》:‘王建成元改摩河池为龙跃池。’王氏《开国记》云:‘建将薨前两月,摩河池有鸚鵡来集,衍即位,仍改龙跃池为宣华池。’《渭南集》云:‘摩河池入王蜀宫中。旧时泛舟入此池,曲折十余里。至宋世,蜀宫后门已为平陆,然犹呼为水门也。’”(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591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39-40 页)。
- ⑩这里的锦城实指成都,而非南郊的锦官城(李白撰、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二十一,第 967 页)。
- ⑪转引自:(英)R. J. 约翰斯顿《地理学与地理学家》,唐晓峰等译,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257 页。
- ⑫汉、晋、唐时诗作中,蜀国与蜀都往往合而言之,本文亦不作具体区分。
- ⑬《华阳国志》以褒斜为前门,左思《蜀都赋》“廓灵关而为门”,而李白则以剑阁为蜀都北门。诸说稍有不同。
- ⑭任乃强认为即今日汶川县九顶山(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21 页)。
- ⑮类似于美国有不少地名以英国郡名命名,惟加一“新”,以示区别。如 New York, New Hampshire 等地名即保留了殖民者对英国旧郡的记忆。
- ⑯司马承祯《天地宫府图》:“第七峨嵋山洞:周回三百里,名曰虚陵洞天。在嘉州峨嵋县,真人唐览治之。”见:张君房纂辑、蒋力生等校注《云笈七签》卷二十七,华夏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54 页。
- ⑰可以参考杨洪林《汉水、天汉文化考——兼论〈牛郎织女〉神话故事的源流》一文,该文对于二者之间的联系,进行了许多梳理,其中重要探讨了汉水与天汉成为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的地理渊源(《武当学刊(社会科学版)》1993 年第 4 期,第 46 页)。
- ⑱我们通检李白全集,发现还有多处涉及到石镜意象。《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好为庐山谣,兴因庐山发。闲窥石镜清我心,谢公行处苍苔没。”(参见: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十九,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678 页。)又,《寻阳送弟昌岷都岷司马作》:“松门拂中道,石镜回清光。”(同上,卷十八,第 846 页)在李白笔下,这些石镜意象,或有蜀地石镜之渊源。
- ⑲约翰斯顿在解释斯皮尔伯格关于“想象的自我易位”时说:“通过替代别人想象而不是通过感知,通过观察者力图把自己转换到主体的位置,并从这个位置上重建他或她的生活世界,就可以取得本质的见识。”参见:[英]R. J. 约翰斯顿《哲学与人文地理学》,蔡运龙、江涛译,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第 104 页。
- ⑳原为丙辰,与下文之“丁酉”相差 41 天,甚不合。且《通鉴》即作“丙申至马嵬驿”(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中华书局 1956 年版,第 6973 页),从之。
- ㉑虽然,在乾元三年(760),就将蜀郡的南京地位取消,“南京”这个称呼或许仅可视为玄宗幸蜀的一个见证,但成都使唐王朝文化血脉得以庇护的历史作用仍然是应该肯定的。严耕望《唐五代时期之成都》有云:“唐都长安,承平时代,仰蜀中为物资供应之府库,亦恃蜀中为西南之屏障。关中有事,皇室土庶恒恃蜀中为退避之所。”(《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卷上,中华书局 2006 年版,第 175 页)如此看来,李白的荣幸感亦非无据。
- ㉒唐代李潜《松窗杂录》亦言及此事,所言更详。见:李潜编、阳羨生校点《松窗杂录》,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213-1214 页。
- ㉓㉔转引自:[英]R. J. 约翰斯顿《哲学与人文地理学》,蔡运龙、江涛译,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103、122 页。

## 参考文献:

- [1]李白(撰),王琦(注).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2]安旗,薛天纬.李白年谱[M].济南:齐鲁书社,1982.
- [3](美)凯文·林奇.城市意象[M].方益萍,何晓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 [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3.
- [5]卢照邻(著),李云逸(校注).卢照邻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8.
- [6]骆宾王(著),陈熙晋(笺注).骆临海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7]程大昌(撰),黄永年(点校).雍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2.
- [8]詹鍈.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

- [9] 康骈. 剧谈录[G]//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 [10] 陈元靓. 岁时广记[M]. 长沙: 商务印书馆, 1939.
- [11] 吴任臣. 十国春秋[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12] 佚名(撰), 何清谷(校释). 三辅黄图校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 [13] 酈道元(著), 陈桥驿(校证). 水经注校证[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14] 班固(撰), 颜师古(注).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15] 曹学佺. 蜀中广记[G]//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591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
- [16] 彭大翼. 山堂肆考[G]//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977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
- [17] 杜甫(著), 仇兆鳌(注). 杜诗详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18] 彭定求, 等. 全唐诗[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 [19] 张唐英. 蜀棹机: 卷上[M]. 长沙: 商务印书馆, 1939.
- [20] 乐史(撰), 王文楚, 等(点校). 太平寰宇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21] 常璩(著), 任乃强(校注).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22] 萧统(编), 李善(注). 文选[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23] 祝穆(撰), 祝洙(增订), 施和金(校点). 方輿胜览[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 [24] 刘昫.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25]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 [26] 李肇(撰), 曹中孚(校点). 唐国史补[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 [27] Relph E.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M]. London: Pion, 1976.
- [28] 范成大(撰), 孔凡礼(点校). 吴船录[M]. 范成大笔记六种.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 On the Triple Geographic Imagination in *the West Tour to Chengdu of the Emperor Xuanzong* by LI Bai

YANG T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hengdu College, Chengdu, Sichuan 610106,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outburst of the An Lushan Rebellion, the Emperor Xuanzong of Tang was forced to escape to Chengdu. One year later, he left for Chang'an. In order to honor the place he visited, his son, the Emperor Suzong, exalted Chengdu as the Capital of the South. Impressed by that case, LI Bai created the group of poems, *the West Tour to Chengdu of the Emperor Xuanzong*, in which thre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were used to visualize Chengdu: the obser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mperor, the grace of the ancient myth of Shu and the imagination of self-translocation.

**Key words:** LI Bai; *the West Tour to Chengdu of the Emperor Xuanzong*; Chengdu; geography; imagination

[责任编辑:唐 普]